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建築的轉譯：論 1945 後台灣建築中之中國建築形式符號延 變與台灣文化認同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5-H-343-005-
執行期間：95 年 08 月 01 日至 96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計畫主持人：郭建慧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理：黃雅靜、林怡瑜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30 日

建築的轉譯：論 1945 後台灣建築中之中國建築形式符號延變與台灣文化認同

摘要

本報告利用文化研究中的詞彙「轉譯」探討文化實體（建築形式）及主體位置（文化認同）之間的流變性，換句話說，本報告以「轉譯」作為一認識框架，以蘊含「中國」符號的台灣建築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國建築(原作)如何轉譯成台灣建築（譯作），並揭露「原作再現」的「意圖性」(intention)。

台灣建築形式與台灣文化認同之間的轉譯與流變，無可避免的議題即是「中國」與「台灣」如何被符號化，如何從中國建築的符號系統翻譯成為台灣建築的符號系統，進而滲透入文化認同。因此，本文針對 1945 年後至當代蘊含有「中國」建築符號之台灣建築作為研究對象，企圖闡述

其中研究問題的主軸包括：

1. 透過建築事實－中國建築元素在台灣的演變－指涉了何種歷史經驗與意圖？又說明了何種台灣文化認同定位？
2. 在接受中國文化美學之時，中國建築元素的展演是否亦成為維持國家(中國？或是台灣？)象徵？
3. 當中國建築符號體系轉化扮演一種政治論述的符號文本，是否僵化台灣建築形式語言的發展及規範了形式背後的認知模式與意識形態？
4. 而中國建築形式符號流通在後現代台灣的本質意義又為何？

前言：

何謂「台灣」？如劉紀蕙於《中外文學：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專輯》中指出，指出，尋找台灣的文化認同，無可避免的是「中國」與「台灣」如何被符號化的議題（劉紀蕙，2000：17），透過視覺化的再現符號，我們看到什麼形式及內容的文化定位？而這些指涉文化地位的圖像又牽引出台灣歷史定位及「他-中國-文化」的區隔或連結問題？（劉紀蕙，2000：17）。而這些議題又如何被放置於建築文本中討論，在文化研究一系列針對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的議題上，¹卻不見此議題在建築研究中被討論。

建築是一居住的容器，藝術作品（包括建築）的形式並非是身外之物，是使我們得以了解事物的要素之一。然而，文化實體（建築形式）及主體位置（文化認同）之間的關連性並不單純是技術面的問題，在這實感的物件中隱含的是一系列可視為語言的符號體系，是一意義建構的過程，而「翻譯」或「轉譯」，除了是實體語言符號系統的轉換外，其中還包括主體意義的流動，在發揮語言建構意義的功效同時，在「他者」與「自我」間產生意義的溝通與辨證。翻譯不僅僅是技術性的文字化過程，《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書

¹ 關於台灣文化圖像與中國的關係目前研究有：劉紀蕙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聚焦與失焦：文學與藝術中「中國」符號的延變》；中外文學 2000 年 7 月特輯《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專輯》；

中，周蕾將「翻譯」的媒介移轉到符號層面，也就是她所說的「互符號實踐」（intersemiotic practice）--就是「從一種符號系統翻譯到另一種符號系統的觀念」（轉引自：吳哲良，2005）。翻譯，不只是一種中立的語言轉譯，而且是「跨語際實踐與互符號實踐」（吳哲良，2005）。同時吳哲良指出，「『翻譯』不僅是對客觀歷史情狀的一種描述或指認方式，而且是研究者有意圖的識框與解析途徑（吳哲良，2005）。」當文化研究將「翻譯」作為一種認識框架乃至於研究方法，解讀文化現象時，在建築語彙中，是否亦存在著某種翻譯的過程？

台灣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國，「中國」此一元素以不同方式「符號」身分建構了台灣文化產品，不論其形式或內容（文學、繪畫、電影等等）皆透露了臺灣人對此一元素的反應，展演複雜的祖國認同、分裂的意識、曖昧的吸拒效應等不同意義（劉紀蕙，2000：17-18）。單純的「台灣觀」或簡化的「中華國族主義」看待台灣建築之演變無疑是一種分裂、區隔的閱讀方式，抹消了台灣社會發展的真正性質及文化內容。台灣建築的發展特色及歷史解釋，不應、亦不能脫離台灣與中國歷史和主體性互動發展的脈絡，我們對建築的研究應在不同的參考架構上做描述，以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新觀點。在這「互符號實踐」脈絡中，如本雅明於〈譯作者的任務〉一文中指出翻譯的語言並非複製原作，而是再現原作的「意圖性」（Benjamin，1998：73），那麼在這些「中國」的建築符號中呈現何種「意圖性」？

過去的評論者大多以「純」建築紀錄史觀紀錄的角度探究中國建築風格在台灣發展的情況，如傅朝卿所著《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單單以形式主義的文本分析檢視，所呈現的是中國建築在台灣發展的連續性，美學取向、藝術形式，但也落入而忽略「中國」為文化元素轉譯成一政治符號文本所提供的意識形態規範，雖然廖建彰 2001 年所著《建築神話—戰後台灣「現代中國建築」論述的形構（1940 年代中~1990 年代末）》一書針對中國建築的文化象徵表現，進行的情感動員與領導權（hegemony）的剖析，但對 1990 年後後現代時期的境況未加以敘述。本篇報告除探討中國視覺形象—建築形式符號—在台灣流通之情形，移入台灣之動機與支配力，同時，本報告亦企圖突顯中國建築的符號體系在台灣情境下所發揮之效用，在「中國」成為各種文化體制的宰制力量的同時，台灣建築呼應中國論述與中國建築形式下，如何牽引出「台灣主體性」的相對位置，更重要的是，目前相關建築研究報告並未以後現代論述檢視中在台灣的中國建築風格，中國建築形式符號流通在後現代台灣的本質意義又為何？文化研究中的「翻譯」或「轉譯」提供我們不同的理解。

翻譯的政治

翻譯以巨大的力量構建對異域文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同時也更見著本土的主體（Venuti，2000：327）。

「翻譯」一詞雖是特指把一種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活動，然而，在文化論述中亦以「翻譯」的概念作為解讀思考文化現象的框架。本雅明於〈譯作者的任務〉一文中指出翻譯的語言並非複製原作，而是再現原作的「意圖性」（Benjamin, 1998: 73）。如吳哲良在〈翻譯的皺褶〉一篇文章中指出，「『翻譯』不僅是對客觀歷史情狀的一種描述或指認方式，而且是研究者有意圖的識框與解析途徑（吳哲良，2005）。」

翻譯除了是雙重文本的流通性的建構，同時也在形塑文化身份。在透過語言建構意義的同時，意義解讀的流動，翻譯涉及「自我」對「他者」認知模式，製造意義的方法，成為「他者」與「自我」主體互動的呈現，甚至成為建構文化認同的手段。

「翻譯」是文化操作機制藉以激起集體文化想像與投射，其中不僅僅是物件形式上的轉譯，同時亦牽涉主體性的轉譯。換句話說，譯本在社會流通、運用、閱讀或傳授的同時，亦參與了本土主體的定位，干涉了本土主體的價值建構，「翻譯在建構異域文本與文化的本土再現的同時，也建構的一個本土主體，這是一個可資理解的位置（a position of intelligibility），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立場（Venuti, 2000: 329）。」翻譯絕非單純的符號複製，而是超越純形式，進入符號的語言功能，進入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層次，一種追求原始的慾望，意欲成為他者，而這種「對於認同的模擬慾望促使他將自己融入他者的意象、形影和符號，將他自己反轉為他者的想像（劉紀蕙，2000: 20）。」透過轉譯，相互影響；並且將他者（異域）「整合」成為自我（本土）的「內在狀態」。換句話說，翻譯不僅僅是形式的生產工具，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建構的機制。

翻譯異文化不可避面會對本土文化本身帶來或顯或隱的影響。翻譯不僅僅牽涉譯者本身文化價值，同時亦是譯者對於異文化的瞭解的展現。由於價值觀、彼此自身的經驗和思想上的異質性，翻譯主要策略包括「異域化（foreigniz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Venuti, 2000: 327）。」「被殖民的主體以接合殖民者自身條件的方式進行自我呈述（引自周蕾，2001: 60）。」由於某些異域語彙並不存在於本土語彙中，因此透過「異域化」來強調這些外來的語彙的價值，然而，這異域化的最終結果在於「歸化」的目的，使這些外來的語成為本土語言體系的一部分。「翻譯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歸化過程，其間，異域文化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體議於理解的語言和文化價值的印記。這一打上印記的過程，貫徹了翻譯的生產、流通及接受每一個環節（Venuti, 2000: 328）。」

「對異域文化的選擇和翻譯策略的制定，能為異域文學建立起獨特的本土典律，這些典律遵從的是本土習見中的美學標準，因而展現出來的種種排斥與接納、中心與邊緣，都是與異域語言裡的潮流相背離的（Venuti, 2000: 328）。」這些文本不再保留異域文化的價值或傳統，並使異域文化脫離所謂的歷史性。

翻譯能夠製造出異國他鄉的固定形象，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的政治與文化價值，從而把那些看上去無助於解決本土關懷的爭論與分歧排斥出去。翻譯有助於塑造本土對待異域國度的態度，對特

定族裔、種族和國家或尊重或蔑視，能夠孕育出對文化差異的尊重或者基於我族中心主義、種族歧視或者愛國主義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從長遠來看，通過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礎，翻譯將在地緣政治關係中強化國家間的同盟、對抗和霸權（Venuti，2000：329）。

翻譯指向了權力，力量與知識。將異域文本納入本土涵構中，翻譯機制被單純地視為理所當然的形式（語言）間的操作，卻隱含著意識中心建構，這牽涉了國族意識的建構，「儘管翻譯是用來處理異域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的，但它對於催育或者壓制本土文化中的異雜性可能同樣有效（Venuti，2000：330）。」翻譯的文本具有不同程度的權威性，而這些權威性並不單單關涉於藝術和創作性的意義，而是延伸至文化身份認同的建構。

國族想像與符號霸權

不同時期建築設計以圖像修辭和非語言形式展演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透過不同時期對於中國建築元素的轉換，構出屬於台灣認同模式的建築圖像，呈現文化認同建構模式的轉變。1945年後建築作品企圖突顯出一股傳承中國建築美學，形式操作上以仿/擬古為原則，如盧毓駿(1904--1975)作品，包括國立台灣科學館（1959）、文化學院大成館(1960)、台北孔廟明倫堂(1960)、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1960□)、交大圖書館(1960)、交大教職員宿舍(1960)、華岡校舍(1961)、文化大學大仁館(1961)、文化大學大義館(1961)、文化大學大倫館(1961)、文化大學菲華樓(1961)、日月潭玄奘寺與慈恩塔(1961)、考試院辦公大廈(1968)；考試院兩部辦公大廈(1968)等等；修澤蘭設計中山樓（1966）；永利建築事務所國立歷史博物館（1954）；王大閎作品，如外交部大樓(1972)、國父紀念館（1972）等等；黃寶瑜所設計的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1965）、石門水庫涼亭；楊卓成設計中正紀念堂（1980）、台北國家音樂廳(1987)、圓山飯店（1971）；漢寶德設計澎湖活動中心（1984）、桃園南園（1985）、國立台南藝術大學(1996)；李祖原設計東王漢宮及大安國宅（1987）、台北宏國大樓（1990）、中正大學行政大樓（1991）、高雄長谷世貿大樓（1992）、中台禪寺（2001）、台北 101（2005）等等；黃永洪的幸安磊（1993）、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大樓（和黃永沃，1996）等等；然而在接納中國文化美學之時，中國建築元素的展演是否亦成為維持國家(中國？或是台灣？)象徵？轉化為一種扮演政治論述的符號文本？以中國建築語彙僵化台灣建築形式語言的發展及規範形式背後的認知模式與意識形態？透過建築事實—中國建築元素在台灣的演變—隱藏了何種歷史經驗與政治事實？又說明了何種台灣文化認同定位？而中國建築形式符號流通在後現代台灣的本質意義又為何？本報告旨在討論台灣建築不同時期之文化再現系統中所使用的中國建築符號，並進而深入台灣文化認同之矛盾複雜之脈絡。

建築符號顯示著歷史、政治、社會等多層意義。中國建築在台灣的應用必非純粹的建築問題，其中包括政治定位和民族意識辯證間的互動關係。中國與台灣

的關係顯現著某一種翻譯的現狀，同時，它也指示著某種翻譯的政治，中國與台灣的符號怎樣被引用、翻譯、挪用、佔有等等，從而建立台灣的文化身份的認同。

「任何語言符號的意義在於它能夠翻譯成某一種進一步的另類符號（引自周蕾，2001：21）」。然而，這些建築符號一旦離開中國，就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和目的。

台灣與中國關係間複雜微妙的變化，迫使台灣建築雖無法完全以「去中國」的方式來解讀，卻也無法以總和化(totalized) 的中華民族主義來涵括。過去一百年台灣與中國大陸絕大部分時間受統治於不同政權，但兩者所處的環境有多層交會，而且受到相似的文化發展邏輯所制約，因此「中國」文化機制是持續在台灣發揮其功效。「轉譯」持續發生於兩者之間，不同的知識體系、思維邏輯、認同價值、中國與台灣關係的扭轉，不斷產生中心/邊緣、祖國/離散(homeland/diaspora)的互動、置換、易位等，不同時期引出不同形式的「台灣-中國」之交錯主體意識及文化主題、內容和形式

台灣對於「中國」此元素的情感投射與認同展現在台灣建築的形式中。中國建築圖象是中國文化在台灣存在及延續的方式，從 1949 年國民政府移師來台，在國黨統御機制的運作下，強力把中華民族主義引進台灣，二次大戰的幾年間台灣在建築形式上從日本殖民體系被結構性的轉換成中國大陸的現代性，以「中國中心」為主要政治定位，統一中國民族文化憧憬投射在文化形式上。此時，文化形式被賦予積極的代言意義，用來推動意識型態的轉型，藉中國建築符號的移入為一種權力機制的宣示，加深對「祖國」之想像與認同感，此時符號為權力運作媒介，形塑與建構國族神話，同時，其中亦含有語意霸權，迫使符號流通合理化，對建築論述與創作具有高度決定性與壟斷性，中國建築形式在台灣的流通性擺脫了社會與政治及市場效應，具有不受檢驗之權威性。

中國建築在台灣的模式並非是展現「中國性」，而是實踐「中國化」，將「中國性」翻譯成處在台灣中心的認同本質。受「中國中心」政治定位的影響，台灣族群意識到中國民族即是自身，把中國建築所提供的形式標準內化，台灣族群被控制在不可變動的「中國」主體性。中國建築符碼透過建築創作得以延伸，國民政府將中國建築形式應用於台灣環境中予以正當化、合理化，知識分子所認同的「國族」等同於「中國」，這些中國的建築形式可視為簡化的國族認同的描述語，不僅僅是形式的引入，同時也輸入在中國產生的文化概念，藉著此形式相應及鞏固「國族神話」，然而，建築專業一貫趨附「廟堂」中心的態度，卻也喪失了建築作為行動者的本質與侷限。

五、六〇年代台灣的急欲塑造的集體經驗，六、七〇年代對中國的懷鄉浪漫情感，而在這背後所牽涉的卻也是文化的壓抑，而無法接受任何國族認同基礎之外的前衛與現代主義作品，文化無法發言的窘境。八〇年代政治質變的過程中，在以中國為文化價值已逐漸被以台灣主體取向的思維方式所去代，從傳統之國族建構說轉移到台灣主體認同之境況，在建構文化認同及社會意識的同時，在中國未全然成為台灣的「他者」時，這特殊時期充滿了妥協、權宜的特殊組合，主體性的模糊，對於文化認同的再現文本，中國民族主義被塑造為主要遵循架構，與

實際創作生產，及接受產生顯著的空隙、摩擦，貌合神離的關係。

如楊照：「如果說五〇、六〇年代是靠政治意識建構神化的時代，七〇年代就是艱苦東挪西湊努力調整、維持神話的時代（劉紀蕙，2000：4）。」在以「本土」作為論述基礎上，隨著文化場域內本土意識高升的同時，中國對台灣而言已成為文化他者，中國符號在此時是自我的「原初性」和他者的「異質性」，對「中國」的追尋不再是捕捉「中國」此一符號，而是展演出了「非」中國的切除推離動作（abject）（劉紀蕙，2000：8-9），衝撞深植在台灣認同中的中國中心主義下的潛意識，因此，新的趨勢毋寧提供了一個可將存在的頑強「中國中心」再加以扭轉的契機，相應而生的是充滿不確定性、多元性、混雜性的台灣經驗價值，因此，七、八〇年代後的建築形式操作準則開始呈現後殖民似的話語，也就是技術化了中國建築的視覺語彙。

到 1987 年政治的解嚴效應，台灣急劇自由化影響了整體文化再現的策略，及面對全球化發展的刺激，在後現代多元意識形態啟發下，多文學作家或藝術家對於既存的霸權論述不約而同進行挑戰時，當祖國的民族意識及情感漸漸消失，對國家族群重新定位之時，同為意識「表達」工具之建築設計亦呼應此種「去中心」(decentering)過程，對當時政治現況及中國中心的抗拒，符號去中心化使得台灣成唯一個符旨開放性的符徵，換句話說缺乏確定的符旨指涉。中國民族意識的終結並不純粹是政治實踐的結果，而且也關乎資本主義剝削與宰制，主流市場和後現代文化的渲染。

台灣對中國符號的經驗變為一種游離懸浮的狀態，符號成為虛幻的、空洞的，傳達虛幻的，空洞的中國意涵，再度出現「中國」此符號，已然具有不同於傳統的符號意義，亦不是某種意識形態內化的結果，台灣族群不再從中國建築符號中定位主體，而是將中國建築符號視為某種「奇觀」，中國建築符號處在一個消費的過程中段，換句話說，符號物化現象（喪失符旨的指涉）促使中國建築符號成為一種消費符號，中國建築符號的流通，從歷史性的建構民族意識的任務變成服務市場的物件。

台灣的主體性透過對中國建築符號的認同構成，這一翻譯過程在內/外、主體與客體間進行異域化與歸化的實踐。儘管如此，中國建築符號包含多重的視覺經驗，不同時期利用不同的文化文本與符號體系尋求或展現自我的定義，因時代的變遷及表達形式及方法的演譯，文本概念、符號及其表達含意會因而改變。從從視覺被政治化到視覺被美學化及物化，從依附威權體制而轉向商業邏輯，從一個教化功能轉化成奇觀式的特質，中國建築符號對台灣身分認同的影響無可爭議的結晶在一個純符徵的符號系統中。

參考文獻

1. 方孝謙，2001，《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台北：巨流

2. 李乾朗，《20世紀臺灣建築》，台北：玉山社，2001
3. 吳哲良，〈翻譯的皺褶〉，文化研究月報，2005，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45/journal_park346.htm
4.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2000
5. 周蕾，《原初的激情》，孫紹誼譯，台北：遠流，2001
6. 許寶強、袁偉編選（2000），《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7. 郭建慧，〈後殖民論述下之台灣都市地景詮釋〉，「南方凝視與環境藝術」研討會，南華大學，2007，頁 13-20，
8. 郭建慧，“Unrooted Otherness? a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ityscape”，建築學報，第 61 期，2007.09，pp. 133-147
9. 傅朝卿，《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台北：南天，1993
10. 廖建彰，《建築神話—戰後台灣「現代中國建築」論述的形構（1940年代中~1990年代末）》，碩士論文，台大城鄉所，2001
11. 劉紀蕙，〈序論：何謂「中國？哪裡有「台灣」？〉，《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
12. 劉紀蕙，2000，《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
13. 《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台灣美術研討會，台北，1996
14. 〈意識的造型與藝術家的工作—座談會紀錄〉，《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頁 336-349
15. 《流轉中：臺灣建築之美》，文建會，2004
16. 《臺灣建築之美》，文建會，2003
17.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45/journal_park346.htm>（2005/12/22）
18. 曾翔姿，《台灣建築思潮於戰後現代化過程之發展研究(1945-2000 年)》，碩士論文，國立雲科大，2004
19. 潘鑫宏，《灣後現代建築研究-1972-2003 年公共建築》，碩士論文，國立雲科大，2004
20. Benjamin, Walter，〈譯作者的任務〉，收於《啓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香港：牛津大學，1998，頁 63-76
21. Said, Edward W. (愛德華·薩依德)，《東方主義》，王志弘等譯，臺北：立緒，1999
22.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翻譯的政治〉，收於《語言與翻譯的政治》，許寶強、袁偉選邊，香港：牛津大學，2000，頁 253-281
23. Venuti, Lawrence (2000)，〈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327-349